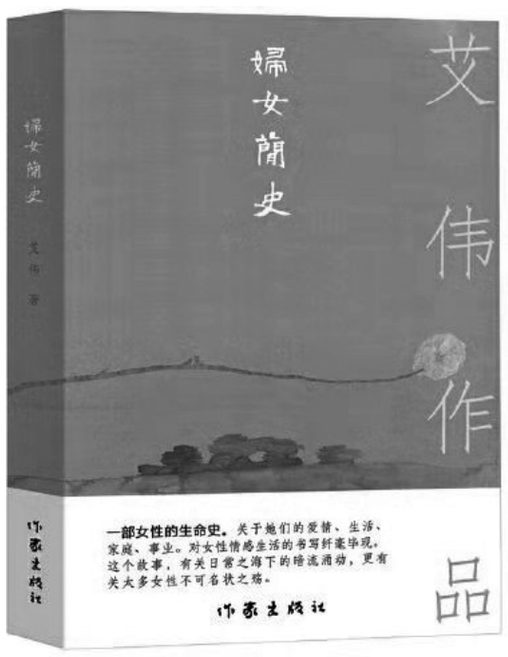
知

编者按

女性主题写作是推进性别平等的重要篇章，也是女性发出自己声音的重要媒介。纪念“三八”妇女节，关注女性主题写作是一个特殊视角。在第111个“三八”国际妇女节到来之际，《新阅读》推出三篇女性主题书写相关作品，其中有新书、有经典作品，还有研究专著。艾伟的《妇女简史》是当代男性作家的又一女性主题书写，使得女性主题书写再次焕发出一种绵延的价值；伍尔夫的经典著作《一间自己的房间》让我们看到一百年前女性写作的不易与突破，以及对未来女性写作的美好畅想；白军芳教授的《陕西女作家小说创作论》梳理了陕西女作家群体的创作成就和艺术表现，其中最重要的是她们在作品中张扬的女性意识。100多年前女性为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做出努力抗争，如今我们亦可以从女性主题书写中探寻性别平等之路的发展进程。

畅读亭

《妇女简史》：以男性之心感知女性



《妇女简史》是作家艾伟的新作，由《敦煌》和《乐师》两个中篇构成。两个女性故事短章在小说的容量和规模上虽未达到“史”的级别，但作者通过几个女主人公也昭示了一种普遍的女性生命样态，隐约可见“史感”的追求。与曹雪芹、舒芜、索莱尔斯、奥兹等前行者一般，该书也是男性女性书写的大主题里叠加进来的新思考。

■ 谢鹏

《妇女简史》（作家出版社2020年8月版）是作家艾伟的新作，近期出版的女性主题写作还有阎连科的《她们》和贾平凹的《暂坐》。当代男性作家不约而同的女性主题书写，使得女性主题书写再次焕发魅力。

男性作家们为何热衷于记录、想象、表现女性的命运？他们的写作能够展现女性的处境，获得读者的认可吗？他们对于女性困境的揭示有何独特的视点与价值？且不说曹雪芹为“闺阁昭传”，蒲松龄借狐妖女鬼为女性鸣不平，笔者还联想起奥兹的《了解女人》、索莱尔斯的《女人们》，甚至一本几乎与艾伟小说同名的通识教育读物《女权主义简史》也重临我的回忆。怀着些期待，我进入艾伟小说的世界。

女性情感的剪影

《妇女简史》由《敦煌》和《乐师》两个中篇构成，说是“简史”，也还谈不上是女性横轴画卷和纵深图景的舒展。艾伟只选取了两个女性故事短章——一篇是关于一个县城女性小项的情感发展历程，另一篇则讲述了一对父女决裂与和解的辛酸故事。虽然小说在容量和规模上还未达到“史”的级别，但作者想通过几个特定女主人公来昭示一种普遍的女性生命样态，建立起“历史感”的追求隐约可见。两个故事读来也令人不能释然而感喟。

《敦煌》将一个女性的情感变故样本呈现在读者面前，无法解决，没有答案，叹息而惆怅。在妻子出轨被丈夫视为奇耻大辱的环境中，出轨的小项默默承受惩罚，而丈夫也肆意地操弄主流文化标杆支撑他的尚方宝剑，对犯错的妻子进行性的、精神的折磨。艾伟对于女性心理的揣摩和刻写是比较成功的。在形象塑造上，他精细地呈现了丈夫对于妻子出轨的扭曲心态。

《乐师》同样是现实主义色彩的。父亲因嗜酒错杀死了妻子，锒铛入狱，导致家破人亡，最大的孽债是——女儿对他的深刻敌视。新闻事件随时而逝，不断被新的时事覆盖而遭遗忘。有心的作者，自会默默耕耘这人世间的凄苦，将人情冷暖的褶子打开。在这点上作者担负起了人类情感守望的责任。普通人生活的惨烈里有无限丰富的转折，这也是小说的可能性。父女之间会和解吗？会以何种方式和解？小说担负着探索的功能，因而还有了悬疑的意味。

然而，此小说尽管写了一个遭遇特殊的女子的故事，但小说看起来更像是关于人性的犯罪与赎罪的故事。从男性作家写女性故事到男性作家的女性主义书写之间还是有一些视角与观念的壁垒。

隐匿的文化压迫

即便如此，从两个故事中我们仍可以梳理出隐藏的男权架构对于女性的压制。小项的情感历程是芸芸女性情感的缩影：从年轻时的“自我纯净”——入社会后，暗恋、沉醉于身边所谓优秀男士——现实因素的考量下，进入将就的婚姻——偶然机遇造成的情感插曲——开始情感的觉醒——陷入出轨的悔罪与离婚的拉锯战中——最后被迫出走。这其中，女性被假定为情感的无师自通者与纯洁者——不允许做出错误选择。一旦她的情感选择逾越了社会道德规范的预设轨道，必将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

那么小项的丈夫陈波代表的是一种什么力量呢？他几乎是一个完美的男性形象。妻子的出轨，使得他作为一个受害者的形象出现。他自幼承袭主流文化的“遗赠”——女性是男性所属物，并没有表现出现代专技人士应有的理性，更不能奢望他对妻子情感的真正理解。那种隐匿而强大的性别文化观念，对陈波来说也是一种致命的毒药。

不单是陈波，小说中的其他男性无论事业和个人如何优秀，但是在性别观念上的束缚是沉重的。他们都接受不了情感的波涛，或伪装婚姻幸福或者因失恋而疯狂游戏报复，其本质都还是视女友或妻子为自己情感的奴隶，必须服从他们的节奏，接受他们的支配，没有去留的自由。

唯一看起来清醒的，是小项的朋友周菲。她对于个体情感觉醒有自知，但同时知悉这种觉醒在现实的危险。她曾劝告小项，“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婚姻……你以后会知道稳定的婚姻对于女人来说多么重要。”周菲是小说中唯一与女性主义产生了关联的人物。“周菲说，她不是女性主义者，不过她是女性坚定的维护者。周菲认为女性不需要同情，而是需要赞美。”

在《敦煌》中，所有的感情都是不堪的，而感情的探索充满了阻力。艾伟说，“小说像一面镜子一样照耀着我们内心隐秘的想象、欲望和生活。”他也许是要借这并不时髦的故事，唤起人们对于情感关系，尤其女性情感的继续反思与理解，提示人们，在性别平等旗帜高扬的时代，女性（人）的情感觉醒和探索依然艰难重重。

建筑学背景的作家艾伟，笔触一直是知性而细节、情感精确的，行文没有多余的煽情与渲染，能把“两性关系写得纤毫毕现”。他将故事设置在江南小城“永城”，这种写作，也算是平民化立场的讲述，一种反大都市故事的叙事策略。是的，我们身边那些不时髦的往事和故人，也值得我们重新去记录，在我们今天的立场上，不仅去回溯她们的生活，更要去反思我们的文化与观念缺陷。

男作家的女性世界探索

阿摩司·奥兹曾写过一本独特的小说——《了解女人》。小说中的男主人也遭遇了妻子的出轨，在妻子和男邻居相拥触电身亡后，他开启了对妻子的了解之旅。他发现，“曾经再熟悉不过的妻子竟成为心中最大的谜团”，他“开始审视自己的内心，尝试了解女性，拥抱体验新生”。我很迷恋“了解”这个词所代表的姿态，尤其是男性写作者发出的，这代表了一种态势：了解女性的真实感受、她的立场，理解她的选择。男性不要被愤怒所裹挟，不要耻化、放大自己作为受害者的形象。

法国“原样派”领袖索莱尔斯的《女人们》被认为是“20世纪对女性的认知最有震撼力的作品”。他在小说中将对女性的认知、体验与感受，集中概括为一个颇有震撼力的命题，宣称“世界是女人们的，男人们只是一堆渣滓，冒牌货”，同时又宣称“世界是注定要死亡的”。不管他的写作是否与波伏娃的《第二性》“思想接轨”或是呈现出更大的“复杂性”，作为男性，索莱尔斯在女性这一议题上表现出“揭示”与“探索”的姿态，力图用“X光拍到命运的照片”“掀开大自然的面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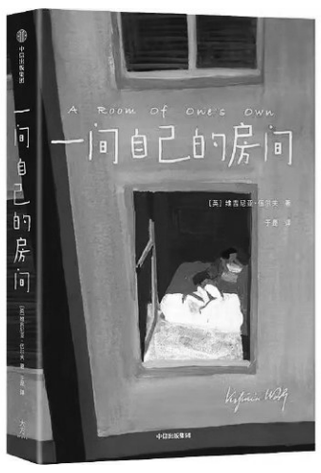
与曹雪芹、舒芜、索莱尔斯、奥兹等前行者一般，艾伟的新作也是男性女性书写的主题里叠加进来的新思考。男作家、人类对于女性世界的认知要永不停息，希望在这些文字的牵引下，更多的男性作家与男性读者去探索、认知与书写女性的情感、生命、精神与创造世界。期待更多的男性走进女性的世界、聆听女性的故事，真正了解女性的精神世界和情感诉求。

（作者单位：湖南女子学院文学院）

品鉴坊

在诗意的女性写作历史长河中唏嘘感叹

——读《一间自己的房间》



■ 李亚妮

“再过一百年，女性就将不再是被保护的性别了。她们理应可以参与本来将她们拒之门外的一切活动和劳动。保姆会去送煤，老板娘会去开车……”我们当今的社会正是这里描绘的“再过一百年”的场景，女性会开车、受教育、会写作，女性已经进入各行各业。而在一百年前，1929年，英国小说家和评论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问世之时，女性写作还是一件刚刚努力争取到的事情。

《一间自己的房间》（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版）是伍尔夫关于《妇女与小说》的两篇演讲稿合集，谈不上纯文学作品，但文章本身又像一首散文诗。作者将自己化身为名叫玛丽的女性，在十月的一个好天气里，在河边、在草坪、在教堂门口、在大英博物馆书架这样的时空流转中时不时扔出严肃的质问，在诗意的女性写作历史长河中唏嘘感叹，让读者紧跟她的思绪和脚步。伍尔夫独辟蹊径，打破惯常的演讲模式，不是“在了解讲演的种种局限、成见和个人偏好之后，让听众们得出自己的结论”，而是如同给一位女性年金500英镑和一间带锁的房间，让她自由创作一样。

房间与女性写作之间有什么关联？伍尔夫出生于一个文学艺术世家，9岁就开始写作。因家庭变故父母相继去世后，她“靠给报社打零工来养活自己”。因为生活窘迫，她没有自己的独立创作。直到获得姑姑500英镑年金的馈赠，她才开始职业写作。她高度赞扬的女作家简·奥斯汀“没有单独的书房可用，大部分作品想必都是在共用的起居室里完成的，时不时被各种情况打断”。伍尔夫设想，如果奥斯汀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傲慢与偏见》会不会写得更好？如果妇女都有一间自己的屋子，那么会不会出现更多的优秀作品？

500英镑是钱，但又不是钱，“象征了沉思的力量”，门上带锁的房间是房间，但又不是房间，“意味着独立思考的能力”。伍尔夫在书中洒脱地、意识流形式地带你思考不同历史时期女性与小说创作之间的各种关系。虽然集中于妇女与小说，但又不限于此，而是从15世纪到20世纪，从河边到餐厅到大英博物馆，在时空穿越与迭替中，将女性在经济、教育、婚姻家庭、就业、政治参与、社会交往以及写作等各个方面的状况如一幅长卷铺展开来。

15世纪的妇女不可书写；16世纪的妇女即使写了戏剧作品或诗集，“毫无疑问，她是不会在作品上署名的。她必然会寻求隐身保命的办法”。17世纪贵族妇女的写作充满对女性写作的渴望和对世俗偏见的愤怒；18世纪和19世纪，贵族妇女可以写信，但写作仍被认为是“有点错乱”，以写作来谋生也并不被认可；到了20世纪，女人写的书几乎与男人写的一样多，而且不再只写小说，还包括各个领域的专著。这是好事，但伍尔夫却又笔锋一转，巧妙转移到女性写作的局限性上。她推崇“雌雄同体”的写作，即打破性别禁锢，独立思考的写作，“任何人，写作时总想着自己的性别，都会犯下毁灭性的错误”。

伍尔夫的语言风趣幽默、灵动细腻，同时又视野开阔，宏巨睿智，像一个个悦动的精灵，洒脱中带着灵魂拷问，意识流中带着历史的沉甸甸，在饱读诗书中将一位位女作家的前世今生娓娓道来，读者跟着她的脚步与一个个灵透的女子对谈，同时也不断给自己设问，“我是不是也可以写作？我写什么？”

“我请大家放手去写各类书籍，不管是琐细或宏大的内容，只管去写，对任何主题都不必有顾虑。”也许你的写作是在一天忙碌之后的夜晚，也许是在“一餐又一餐的饭菜都煮好了，锅碗瓢盆都洗刷干净了，孩子们都送去了学堂，长大成人离开家，踏上社会”之后的晚年，但是，一切都不晚。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新书馆

展现广阔文学视野 张扬独特女性意识

——评《陕西女作家小说创作论》

阅读提示

《陕西女作家小说创作论》以女性文学研究新动向“性别诗学”和新世纪文学视域下纷繁的社会现象为背景，对新世纪陕西女作家的小说创作观念进行研究，整理作品发展线索，发掘作家在小说创作中所延续的女性意识，以及她们是如何发生转变，进一步深入社会的经济发展、城市文化崛起等现象，描绘她们表达个人与社会、个人与文化、个人与集体等维度的独特思想。

■ 焦杰

“女性文学”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新的文学语境的生成和文学发展新阶段的出现。在文学走向新世纪的同时，陕西女作家的创作观念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呈现出新的特征。这不仅与女性文学研究走向“性别诗学”的大背景有关，也体现着陕西女作家创作自身的嬗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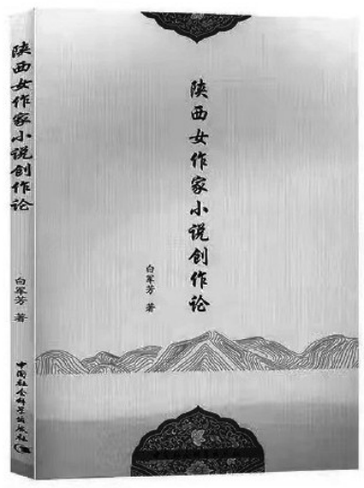
《陕西女作家小说创作论》以女性文学研究新动向“性别诗学”和新世纪文学视域下纷繁的社会现象为背景，对新世纪陕西女作家的小说创作观念进行研究，整理作品发展线索，发掘作家在小说创作中所延续的女性意识，以及她们是如何发生转变，进一步深入社会的经济发展、城市文化崛起等现象，描绘她们表达个人与社会、个人与文化、个人与集体等维度的独特思想，揭示陕西女作家小说创作的艺术成就与时代、个人素养、家国情怀等之间的联系，为读者展现了新世纪陕西女作家小说创作所具有的更广阔的文学视野和经过积淀的更为深沉的文学史观。

《陕西女作家小说创作论》是西安工业大学教授白军芳的十年心血之作，202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是宏观分析，下篇是个案研究，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全面细致梳理了陕西女作家群体的创作成就和艺术表现，其中最重要的是她们在作品中张扬的女性意识。

陕西女作家小说创作的丰硕成果

在上编中，白军芳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陕西女作家分成三代，从她们的作品入手，通过剥丝抽茧梳理与分析，不仅向读者详细展示了陕西女作家小说创作的丰硕成果，而且提炼出一条自新中国成立到21世纪初期的陕西女作家小说创作的脉络。白军芳以丁玲、贺抒玉为陕西女作家的第一代代表，分析了她们作品中先进的性别思想；以叶广芩、冷梦、周瑄璞等为第二代代表，分析了城市文化对于女作家小说创作的影响；以唐卡、杜文娟等为第三代代表，分析多元化审美倾向给女作家小说创作带来的契机和创新。

在下编中，白军芳分别对贺抒玉、叶广芩、冷梦、周瑄璞、杜文娟等的小说进行单章评论。针对不同作品的不同审美风格，有的提炼高蹈的性别意识，有的重视时代主题的创新，有的突出文学的新变，有的探索小说创作理论的转向。对于作家的评论，并没有追求面面俱到，而是强调作品的独特成就。比如对于杜文娟《红雪莲》小说的创作，突出援藏主题在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贡献，以及女作家在重重困难阻隔下，只身入藏的可贵精神，揭示出该作品的知识叙事和红色书写的特征。在2020年全球疫情形势严峻的情况下，《红雪莲》的象征精神，突破了藏族文化的吉祥寓意，成为中国人民克服困难，共同追求民族和国家未来的凝结体。它代表的宣传中国元素的趋向，改变了大众文化占主流的状态，使延安时期的红色精神在当代再次绽放异彩。这样的评价，不仅是陕西女作家杜文娟的艺术直觉的创新，而且还是社会主义文学的重新书写。杜文娟的作品应该在新时期得到重视，加强宣传，成为女性文学的新收获。



对作品女性意识的重点探究

白军芳在著作中对陕西女作家作品的女性意识进行了重点挖掘。她认为，爱的无私奉献和事业的追求是陕西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最大主题。在新的历史阶段，女性的独立意识有很大的发展，从早期的丁玲的据理力争，到新世纪叶广芩的聪慧、大胆，再到周瑄璞的城市书写，再到杜文娟的女技术人员的塑造，这些作品明显表现女性作家不再拘囿于女性是否遭遇歧视的问题，而是用自己的能力改造世界、使世界更美好的新动态。

对陕西女作家作品中所呈现的性别意识的影响，白军芳也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她认为：贺抒玉对于普通女劳动者的歌颂代表了社会主义女性文学的先河；叶广芩的生态文学思想是建立在女性睿智、宽容、怜惜生命的基础上的；周瑄璞的女性意识建立在西安女性寻找独立生存空间的探索上；杜文娟的西藏小说，虽然不是报告文学，但亲身经历的痕迹很明显，女性在援藏的道路上，学习新知识，带去新思想，团结藏民和其他援藏者，塑造了一位不惧艰险、为祖国事业发展默默奉献的新时期女性形象。在作者的视阈中，这部著作既有对著名女作家的创作思想的提升，也有对默默无闻作者的挖掘，资料详实、线索清楚、观点新颖，是不可多得的学术著作。

总之，《陕西女作家小说创作论》既描绘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陕西女性作家的发展线索，又总结了她们面临时代变化书写女性意识的特征，还提升了她们小说的审美价值。无论在女性文学发展史上，还是在陕西文坛的艺术影响力上，都能够把握核心观念，关注新的社会发展，以正确的批评方法进行更为深刻的文学分析，是符合当代社会主义文学发展方向的，也是推动陕西文学发展的一大助推力，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